

学术与社会

章清著

近代中国『社会重心』的转移与读书人新的角色

近

代

中

国

研

究

书

系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近代中国研究书系

章清 著

学术与社会

近代中国「社会重心」的转

新的角色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术与社会:近代中国“社会重心”的转移与读书人新的角色/章清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近代中国研究书系)
ISBN 978 - 7 - 208 - 10830 - 1

I. ①学… II. ①章…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0661 号

责任编辑 毛志辉

封面设计 范昊如

· 近代中国研究书系 ·

学术与社会

——近代中国“社会重心”的转移与读书人新的角色

章 清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21.25 插页 2 字数 295,000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0830 - 1/K · 1902

定价 42.00 元

总 序

“近代中国研究书系”汇集的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科部分教师的成果,是以主题的形式辑录各教师所发表的专题论文。

历史学系是复旦大学最为悠久的系科之一,1905年复旦公学高等正斋创设伊始,就在文科中开设有历史学几门课程。1925年正式设系,时称史学系。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得到江浙多所大学著名史学家加盟,实力大为增强。在中国史方面,有周予同、谭其骧、陈守实、胡厚宣、马长寿、蔡尚思、杨宽等教授;在世界史方面,有周谷城、王造时、耿淡如、陈仁炳、章巽、田汝康等教授。前辈学者常常言及,那时的历史学系,与中文系一起共同构成复旦文科的“两个超级大国”。此后,历经几代学者的努力开拓和辛勤耕耘,历史学系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并且始终占据复旦文科发展的最前列,用周予同先生的话来说,历史学系的发展就是要“为复旦争取学术地位”。

这其中,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尽管起步稍晚,也得到很好的发展。中国近代史最初只是“中国史”的一部分,1954年中国史划分为中国上古史(主任胡厚宣)、中国中古史(主任谭其骧)、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主任陈守实),至此中国近代史算是在建制上初步成型。1958年中国史方面的上古史、中古史教研室合并为一(主任陈守实),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则发展为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室(主任胡绳武)。到20世纪70年代,又形成包括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中国现代史教研室和中

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建制,这些都显示中国近代史学科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形。正是通过蔡尚思、胡绳武、金冲及、汪熙、陈绛、陈匡时、黄美真、余子道、沈渭滨、黄苇、杨立强、朱维铮、李华兴、姜义华、刘其奎、赵少荃等学者的努力,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为海内外学术界所瞩目,尤其是在思想文化史、中外关系史、汪伪政权史、资产阶级史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集体编撰的成果即包括有《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现代中国思想史资料简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等。1994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成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1996年建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1998年成为国内首批五家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这些皆为体现复旦历史学科整体研究实力的标志,内中也包含中国近代史学科的贡献。

步入21世纪,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科又有长足发展。以该学科为主体成立的“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姜义华任主任,吴景平、章清任副主任),2004年列入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2007年,中国近代史学科还被列入“国家重点学科”。此外,本学科承担了国家及省部级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多部有影响的学术著作问世,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重要刊物发表数十篇专题研究论文,还编辑出版了《近代中国研究集刊》和《近代中国研究专刊》。本学科每年都主办两次以上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学术活动,使本学科始终站在学术前沿,在海内外的学术影响也进一步扩大。

“近代中国研究书系”选录的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为主的部分教师公开发表的有代表性的著述。这些著述,大都出于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虽由于作者的年龄、阅历、学术视野和价值取向各有不同而各具特色,但都是这些教师在教学科研中开拓挖掘的成果,是多年心血的积累,反映了这些教师的研究足迹和心路历程,也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风貌的一角。通过这些著述,可以把握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研究领域的学术脉络,而且可以以动态的、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审视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科过去和现在,进而为将来的学科建设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是以专题论文的

形式组织书系的出版,因此,还有不少教师的论著未能收入其中,有的教师此前已有集辑出版;暂时还没有这样考虑的,则只有留待他日了。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尊重历史,尊重此前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领域的学术成果,从历史史实和“历史性”的成果中吸取养分,是“创造”未来学术前沿的前提,也是学术发展永恒的宗旨和道理。我们出版这套书系,在借以回顾和总结以往的成绩及不足之时,同时向学界和社会寻求批评,寻求来自更多层面的交流和沟通,以期共同推进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在“近代中国研究书系”组稿及编辑过程中,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人员付出了不少努力,在此表示真诚的谢意!

是为序。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近代中国研究书系”编委会

2012年3月

自序

读史多年,所思考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清季民国这段历史,期间自也曾发文论说,略陈己见。这些散见于学术期刊以及会议论文集的文字,汇集起来已有一定篇幅。正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多少是因为纠结于过去时代读书人的为文之道,对于将习作编为论文集出版,向存敬畏之心。这些年本也有这样的机会,皆因为有所顾忌而未能实现。此次因系众所议决,遂将过去这些年发表的论文稍加梳理,编为一册,以就正于方家。选定“学术与社会——近代中国‘社会重心’的转移与读书人新的角色”这一主题,乃是因为按照三编汇集起来的论文,皆关注到清季民国时期所发生的剧烈的社会变动,以及走出科举时代的读书人所确立的新的角色。这其中,自也包含研究这段历史所收获的点滴心得,不妨在此略加申论,以更好交待撰写这些文字之缘起。再者说,所收录的文字最早的已是十多年前撰写,于今思之,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实已有所调整,也有必要加以说明。

忝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从业者,在归属上还被明确划分到所谓的“专门史”方向。这样的划分自有其理由在,实际上,“专门史”仍然是中国史学学科建制的基本特征,按照各“专门史”组织学术活动,也颇为盛行。然而,回顾过去的研究工作,却发现对此一向有所保留,多少质疑以此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是否合适。所谓“历史研究的单位”,出自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历史研究》中的阐述。从某种意

义上说,对此的思考,也构成其基于“文明”开展比较研究的出发点。该书绪论部分即阐明,以往历史研究的一大缺陷,就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这大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眼界,事实上,“欧洲没有一个民族或民族国家能够说明它自己的问题”。因此,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1〕 尽管《历史研究》的影响力已日渐式微,然而汤因比提醒历史学家不要沉湎于专门领域的研究而迷失方向,要用全面的眼光去看待人类历史,无疑算得上有益的警醒。〔2〕 回过头来看中国近代史研究,亦可发现对此的认知构成此一领域的核心问题。柯文(Paul A. Cohen)所标举的“中国中心观”,就特别指明其取向主要体现在: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开展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3〕 这样的“取向”,多少表明海外中国学的基本趋向是将中国划分为更小的研究“单位”。与之适成对照的是,在通常被视作“专门史”的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却致力于拓展“历史研究的单位”,试图基于“整体”展开研究。譬如,围绕“社会史”就产生了较大分歧——社会史是一门历史学的分支学科,还是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或角度。赵世瑜就坚持应把社会史理解为一种新的史学范式,而不应理解为一个学科分支,这样才能避免社会史研究的庸俗化;社会史是一种整体研究,不应被误解为“通史”或“社会发展史”。〔4〕 其他方面的“专门史”(如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也有相似的声音传递出来。罗志田就注意到近年来各“专门史”的区分较以往更受关注,并致力于划清学科的“边界”。他也明确阐明,这些“边界”更多是人为造成并被人强化的,史学本身和治史取径都应趋向多元,虽不必以立异为高,不越雷池不以为功;似也不必画地为牢,株

〔1〕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2〕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63—266页。

〔3〕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

〔4〕 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守各“专门史”的樊笼。〔1〕

类似于这样的反省,所在多有,或可看作史学经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尝试后新的“自觉”,问题的缘起也可追溯到20世纪初年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新史学”之所以构成中国史学发展的“事件”,原因即在于,无论是“历史”的范围,还是“史学”的书写方式,都发生了重大转变,表现之一是将中国纳入“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的架构进行认识,另一有着重要影响的方面则是规划了“专门史”的书写方向。“新史学”体现的这些特征,乃“援西入中”大潮下中外史学“会通”的产物,展现出史学作为现代学科成长的枢机所在。在此前撰写的文字中,笔者已立足中西历史的“合和”,检讨了西方关于“普遍历史”的观念,如何影响到“通史”的书写架构。我想强调的是,理解中国之历史书写在近代的转变,恐不能局限于进化论,实有必要将问题追溯到与中西交往差不多同步发生的一幕——中西历史之“合和”。将中西历史纳入相同的时间序列,乍看只是涉及史学编纂的问题,然而其意义却不限于史学。关键在于,西方的历史进程既代表着人类“普遍”的发展模式,将中国纳入“普遍历史”,实际是认同西方社会的发展昭示着中国历史演进的未来;进而西方社会演进所经历的,也便具有了不可质疑的“正当性”。〔2〕此外,在别的文字中,还探讨了“专门史”的书写架构,如何规划了影响至今的中国历史书写的方向。“专门史”的成长,与现代学科在中国的形成功密切相关,就某一学科的成长来说,书写本学科中国自身的“历史”,也构成其中重要的一环。从20世纪初年开始,各种以“专门史”为名所撰写的各种历史,也重新塑造了“中国之过去”。而“专门史”书写在催生出大量相关著作的同时,对历史进程的理解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以“专门史”为特征的史学学科规划,也构成了史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3〕

〔1〕 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自序”,第12页。

〔2〕 章清:《“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见杨念群等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264页。

〔3〕 章清:《重塑“中国历史”——学科意识的提升与“专门史”的书写》,《学术月刊》2008年第3、4期。

可以说,在历史研究范围拓展的情况下,提倡专门史的书写,这似乎是为较为可行的解决办法,却未必能解除史家为此产生的困惑。尤其是,当“专门史”导致种种“决定论”的流行,则势必导致对历史的“遮蔽”。论者曾将梁启超《新史学》中所规划的“全体史”比作法兰西年鉴学派所倡导的“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应该说,这两者之间的确存在某种相似性。法国年鉴学派就反对“事件构成的历史”,并且主张广泛吸收其他学科——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现和方法,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一篇文字中即曾说明:“新史学渴望建设一种从人体到生物、置于社会历史时段中的总体的人的历史。一些大生物学家希望以一种内在的而非外在的方式,把他们学科的历史作为一种研究工具,并将他们的研究扩大到包括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以及原来意义上的生物学在内的人类生态学的范围,这两者的结合便预示着一些伟大的前景。新史学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发现与方法,也是梁启超所主张的“新史学”大力倡导的。然而,所不同的正在于,年鉴学派从一开始就注意抵制诱惑,防止把自己分割为许多各行其是的“专门化”部门(如经济史、思想史等等)。这种诱惑在20世纪20、30年代的西方世界也十分突出,年鉴学派却强调,从社会背景中抽离出来的“专门史”,“肯定会使人误入歧途”。〔2〕

“专门史”的书写构成20世纪中国历史书写的主要形式,其引发的结果,更值得重视。实际上,“专门史”的书写架构所导致的认知历史方式的转变,也是极为突出的一幕,特别是由此所催生的“决定论”的意识,更是不可忽略。具体表现出的,或为“经济决定论”,或为“文化决定论”,影响所及,不仅有关“经济史”与“文化史”的著作尤其多,而且还建构起认知历史的“决定论”模式。在此过程中还可注意到极富意义的一幕,即是将各“专门史”的内容悉数纳入“文化史”的架构中,从而更明确了由史家承担“专门史”书写的责任。柳诒徵撰写的

〔1〕 勒高夫:《新史学》,收入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1页。

〔2〕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5—56页。

《中国文化史》对此就有所说明。在该书“绪论”部分,柳具体指出,世间颇为质疑“吾国所谓史者,不过如坊肆《纲鉴》之类,止有帝王嬗代及武人相斫之事,举凡教学、文艺、社会、风俗以至经济、生活、物产、建筑、图画、雕刻之类,举无可稽。吾书欲祛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惟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1]过去的史乘是否如柳所归纳的那样,鲜少这方面的内容,不是这里可以讨论的,但这番话却点出了“专门史”书写的意义所在,那就是要写出此前较少涉及或完全没有涉及的内容。“文化史”兴起所发挥的正是这样的作用,把各种“专门史”悉数纳入。^[2]王云五编辑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趋向。王从事这一事业,是基于中国之旧史“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他曾撰写有《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交待了编印这套丛书的原委。文中汇集了欧美日本学者之著作 234 种,分为 32 类,“一般文化史仅占 18 种,其余 216 种尽属分科文化史”。对比外国学者的文化史著作,他仍然认为“未能窥我文化史之全豹”,“吾国之辉光,分之则为各科专史,合之则为文化之全史”,于是把文化史的范围分为 80 个科目,“以一专家之所长,担任一专科史料之整理”。^[3]80 种科目即是 80 种“专史”,其内容已是无所不包,且均包容在“中国文化史”的架构里。梁启超曾谓“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于史”,这里所显示的是,各种“专门史”无不丛纳于“文化史”。

[1]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南京正中书局 1947 年版,“弁言”,第 1—2 页。

[2] 其他相关的著作亦体现出这一特质,如顾康伯所编著的《中国文化史》就说明,“夫所谓文化者,包罗极广,举凡政治、地理、风俗、宗教、军事、经济、学术、思想,及其他一切有关人生之事项,无不毕具。”见顾康伯:《自序》(作于 1924 年),《中国文化史》(高中师范教本),上海大新书局 1933 年版,第 2 页。缪凤林 1940 年出版的《中国民族之文化》,也指出文化的内涵包括下列十类:(1) 文史;(2) 政治;(3) 经济;(4) 科学;(5) 哲学;(6) 伦理;(7) 宗教;(8) 工艺;(9) 美术;(10) 人物。见缪凤林:《中国民族之文化》,西安新中国文化出版社 1940 年版,第 9—10、31—32 页。

[3] 具体包括:哲学总论 15 种;哲学各论 10 种;经学 2 种;宗教总论 10 种;宗教各论 17 种;经济 14 种;政治 11 种;法制 2 种;外交 8 种;交通与贸易 21 种;拓殖 6 种;文化西渐 5 种;教育 4 种;社会 4 种;语文 4 种;天文 2 种;农业 3 种;工业 2 种;医学 1 种;一般美术 13 种;绘画 7 种;书法 1 种;雕塑 7 种;陶瓷器 8 种;铜器 3 种;音乐 3 种;建筑 3 种;文学总论 11 种;文学各论 6 种;考古 7 种;民族 6 种。见王云五:《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收入《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第 639、648 页。

可以说,“专门史”特别发展出对“思想”、“文化”及“学术”的重视,基于“新史学”成长的背景,亦能有所把握。关键在于,学科意识的提升,使“史学”可依托于“他学”发展。这也是当时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章太炎、陈黻宸、王国维、宋恕等,均立足于此思考史学之未来。宋恕还明确表示,“有一学必有一学之史,有一史必有一史之学,数万里之原案咸被调查,数千年之各断悉加研究,史学极盛,而经、子、集中之精理名言亦大发其光矣!”^{〔1〕}这里所说的“有一学必有一学之史”甚为关键,它所意味的是,随着现代学科观念在中国的确立,史学的学科地位较之过去也有所不同,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实际成为通往其他学科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围绕各学科进行“专门史”书写,不仅成为史学新的方向,也凸显出对“学”的尊崇。这里值得说明的是,“学”与“政”成为论辩之中心,与之也不无关联。

关于“学”与“治”的关系,龚自珍已有“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的看法。^{〔2〕}张之洞对此也阐述了独到的见解,“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3〕}凡此等等,或都提示我们注意近代中国所展示的对“学”的重视的一面。不过,中国社会原本即有强调“学高于政”的因素,将此悉归于“西学东渐”,未必合适。实际上,这本身即构成“援西入中”耐人寻味的一幕。明季李之藻所辑之《天学初函》,按照“理编”与“器编”汇编所谓的“天学”,自是意味深长。^{〔4〕}而梁启超 1896 年写成《西学书目表》,按学、政、教对西书进行分类,也映射出晚清“西政”、“西学”的论辩成为话题的中心。^{〔5〕}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在新的时势下所衍生的新的看法,同样显示出对“学”的重视,并且“学无中西”,“学无新旧”的主张,还逐步化解了由此产生的“紧张”。

〔1〕 宋恕:《粹化学堂办法》,见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380 页。

〔2〕 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六》,《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4—5 页。

〔3〕 张之洞:《劝学篇》,见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 12 册,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705 页。

〔4〕 李之藻:《刻天学初函题辞》,《天学初函》(一),台北学生书局 1965 年版,第 1 页。

〔5〕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饮冰室合集》第 1 册,“文集之一”,中华书局 1989 年影印本,第 122—126 页。

依拙见,现代学科的“援西入中”,大致可以区分出两条不同的线索:其一是依托“国别性”展开论述,故要别立“中西”,辩论“体用”;其二则是立足“普世性”展开论辩,强调知识的“现代性”特征。^[1] 梅文鼎言及会通中西曾有言:“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2]若说此种“去中西之见”的主张在清初可谓空谷足音,晚清时则逐步有了这样的共识,“昔之学在贯天人,今之学在赅中西。”^[3]所谓学无新旧,无中西,通常归之于王国维的发明,其实,自中西接触以来,以此立言者并不乏其人。孙宝瑄 1897 年在日记中就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愚谓居今之世而言学问,无所谓中学也,西学也,新学也,旧学也,今学也,古学也。皆偏于一者也。惟能贯古今,化新旧,浑然于中西,是之谓通学,通则无不通矣。”^[4]而王国维则将有用无用之争、中学新学之争和古今新旧之争,均归于“学之义不明”,在他看来,“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5]

然而,与其说“学无中西”、“学无新旧”,毋宁说真正的改变是西学转化为新学,中西之争也转化为新旧之争,如论者所说的,“西学本身也跨越中西认同的紧张,获得了一个更具普世性的名称——新学。”^[6]各种新学丛书替代各种西学书籍的出版,颇能说明问题。这其中,既有以“皇朝”命名的《皇朝新学类纂》,^[7]也有主要取法日本的《新学大

[1] 章清:《“中体西用”论与中西学术交流——略论“体用”之辩的学科史意义》,收入《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中国近代史研究集刊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2] 梅文鼎:《甄堵测量(四)·郭太史本法》,见梅觐成编《梅氏丛书辑要》卷四十,承学堂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刊本。

[3] 谢若潮:《西学三通·叙》,袁清舫、晏海澜编《西学三通》(萃新书馆精本),上海文盛堂1902年版,第2—3页。

[4]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0页。

[5]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王国维遗书》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

[6] 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可以补充的是,耶稣会士所介绍的新知,究竟当称为“西学”还是“新学”,在当时就曾引发争议,富于意味的是,“耶稣会传教士可以把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坚持说是‘西学’,但中国人却清楚地认识到,那首先是一种‘新学’。”参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天学”,第2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671—674页。

[7] 广益书屋主人编:《皇朝新学类纂》,上海广益书室1901年版。

丛书》，显示在 19、20 世纪之交日本渐成中国摄取新知的主要国度。但不管汇编者的情况有怎样的不同，对学之理解皆突出一个“新”字，如《新学备纂·序》即这样写道：“新世界新学界，一周岁之间，开新理者万，著新书者万。欧美列国日以新学相竞争，而吾国所译述者，万不及一焉。”〔1〕不难看出，由“西学”到“新学”，突出的是学之“普世性”，不仅直面中国处于落后位置，还将世界之竞争定位于“学”：“二十世纪之始正学界武装姤战时代，非学界文德大同时代。”“吾中国通海以后，政界之精神形表日见颓落，学界之精神形表日有进步。”〔2〕

1900 年杜亚泉到上海办起“亚泉学馆”，并编辑《亚泉杂志》，就致力于辩护“西艺”。之所以提倡“西艺”，颇有些反其道而行之的意味，直接针对的即是张之洞《劝学篇》所谓的“西政为上，西艺次之”的看法。说起来，岂止张之洞，强调“西政”，差不多成了那个年代读书人中较为普遍的看法。康有为描述接触西学之初始，曾有这样的评说：“中国西书太少，傅兰雅所译西书，皆兵医不切之学，其政书甚要，西学甚多新理，皆中国所无，宜开局译之，为最要事。”〔3〕相似的意思，梁启超也有所阐述，“吾中国之治西学者固微矣，其译出各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生等本原之学，几无一书焉”〔4〕。康、梁上述常被征引的话，也在传递对“西政”的重视。然而，杜亚泉却认为，“西艺”乃本根之所在，他为该刊撰写序文就表达了对此的思考：“我国自与欧洲交通以来，士大夫皆称道其艺术。甲午以后，国论一变，啧啧言政法者日众，即如南皮张氏所著《劝学篇》亦云，西政为上，西艺次之。”尽管杜也承认“政重于艺，亦我国向来传述不刊之论也”，但“政治”与“艺术”之关系，却并不单纯：“自其内部言之，则政治之发达，全根于理想，而理想之真际，非艺术不能发现。自其外部观

〔1〕 新斋主人编：《新学备纂》“序”，天津开文书局石印 1902 年版，第 1 页。

〔2〕 赵祖惠：《新学书目提要跋》，《新学书目提要》卷一，上海通雅书局 1903 年版，第 119 页。

〔3〕 《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 4 册，上海神州国光社 1953 年版，第 119 页。

〔4〕 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第 1 册，“文集之四”，第 80—82、82—85 页。

之,则艺术者固握政治的枢纽矣。航海之术兴,而内治外交之政一变;军械之学兴,而兵政一变;蒸汽电力之机兴,而工商之政一变;铅字石印之法兴,土风日辟,而学政亦不得不变。且政治学中之所谓进步,皆藉艺术以成之。”^{〔1〕}这里所谓之“艺术”,即是斯时所言之“技艺”,具体指向“诸科学”。^{〔2〕}杜亚泉对“西艺”表达的看法,其实与他所批评的对象并没有多大差别,在晚清的语境中所谓“西政”,涉及面颇广,同样包含着所谓的“西学”。不管怎样,这里所显示的是,对“学”的重视仍一如其旧。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标榜“二十年不谈政治,要为中国的政治变革奠定思想文化的基础”,无非是传递“学术救国”、“教育救国”的信念。这也代表着民初各方人士共同的见解,1913年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汪精卫等聚谈时就表达了这样的共同感受,“皆确实深信:惟一之救国方法,止当致意青年有志力者,从事于最高深之学问,历二三十年沉浸于一学,专门名家之学者出,其一言一动,皆足以起社会之尊信,而后学风始以丕变。”^{〔3〕}蔡元培尤其专心于此,并成为其开启大学教育理想之门的重要动力。在履任北大校长后不久给汪精卫的信中,他就明确表示过,“在弟观察,吾人苟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弟进京后,受各政团招待时,竟老实揭出不涉政界之决心。”^{〔4〕}也不乏读书人对此感到失落,刘师培在给吴虞的一通信函中,就不无意味地表示:“窃以处今之世,道与政学析殊;政之与学,亦弗符合:忱有所仰,研求得真,道之谓也;稽谥俗言,与时偃俛,政之谓也;钩湛攘佚,资消昕夕,学之谓也。斯旨既闾,则今之治汉学,惟在谛古言、审国故。其说弗必决于衷,其证弗必验于俗。”^{〔5〕}研究者也揭示了逐渐认识到中西竞争最终是一场“学战”,是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突出的一

〔1〕 杜亚泉:《亚泉杂志序》,《亚泉杂志》第1册,1900年11月9日。

〔2〕 该刊第1册所登之“本馆谨启”对此有所说明:“此书辑录格致、算化、农商、工艺诸科学。”见《本馆谨启》,《亚泉杂志》第1册,1900年11月9日。

〔3〕 吴稚晖:《吴敬恒选集·序跋游记杂文》,台北文星书店1967年版,第221页。

〔4〕 蔡元培:《致汪兆铭函》(1917年3月15日),见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页。

〔5〕 此为刘师培应吴虞之请,为其开列小学、经学书目一份,并函一件,由孙少荊转交吴虞。此据万仕国编著《刘师培年谱》卷三,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216页。

环;中国士人由此更自觉重视这场文化竞争。〔1〕林毓生先生还阐述了“五四”一代所展现出的“藉思想文化以解决社会根本问题”的思想方式。〔2〕就此而言,民初所凸显的“思想战”,尤其值得重视,就对思想、学术优先性的肯定来说,实无过于此。

杜亚泉在1915年的一篇文章中即明言:“今之时代,为思想战之时代。十八世纪民权思想之普及,美利坚独立,法兰西革命,其他革命战争之蔓延于各国者,不知凡几。十九世纪民族思想之发达,意大利合并,巴尔干分裂,其他民族战争之爆发于各地者,更不知凡几。此回旋澎湃之思潮,更由太平洋印度洋远渡亚东,波及吾国,而有辛亥之役。吾国之思想战,盖以此为著矣。”〔3〕这里所言之“思想战”,其语境与晚清流行的“学战”自不能相提并论,这里突出思想之作用,却是明确的,并且这也构成新文化运动的流行话语。汪敬熙即注意到,自1916年1月《东方杂志》发表黄远生《国人之公毒》后,“有许多人都同声说,我们中国各种坏处的根原就是思想界,并且又说,如想改革中国,第一步就须改革思想。”〔4〕一篇讨论思想界两大潮流的文字,开篇就写道:“诸君大概都知道改革社会,是要改造思想的”。这已是把“思想”之优先性作为讨论问题的前提,进一步还试图说明,思想是一切社会、政治、学术的源头,“思想变了,那学术社会政治一定跟着变”,“凡稍能看报纸杂志的人,大概都知道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随着新出版物一天多一天,所鼓吹的,一言以蔽之,是新思想,分言之:把这思想用到文学上来,便是新文学;把这思想用到政治上去,便是新政治(平民政治);把这思想用到社会上去,便是新社会(互助社会)。”〔5〕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第六节“学说影响一斑”,也曾明言:

〔1〕关于“学战”观念的起源及由此引发的“权势转移”,参见王尔敏《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想》,收入《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322页;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收入《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1页。

〔2〕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51页。

〔3〕伦父(杜亚泉):《论思想战》,《东方杂志》第12卷第3号,1915年3月1日,第4页。

〔4〕汪敬熙:《什么是思想?》,《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1日,第557页。

〔5〕陈问涛:《中国最近思想界两大潮流》,《时事新报》“学灯”,第5卷第4册第29号,1923年4月29日,第1—3版。

“从来社会思潮，便是政治现象的背景；政治现象，又和私人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思潮稍不健全，国政和人事一定要受其蔽。”〔1〕

清季民国时期所展现出的对思想、学术的重视，也并非无源之水。然而勾画民初报刊媒介与读书人的互动，可以让我们看到问题的另一面。这里的关键便在于报刊媒介展示了独特的作用。报刊之所以吸引各方人士投身其中，是看重这一传媒样式的作用；而既投身于报刊，则不免为其正当性加以辩护，“思想革命”话语由此流行开来，自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可以说，要解释五四时期“话语”的流行，或不能忽视报刊媒介构成了读书人主要的生活形态。在这个意义上，突出“社会”的视野，对于认知思想、学术的发展，也自是题中应有之意。

之所以结合“学术”与“社会”展开话题，无非是突出“社会”的视野，尤其是重视中国社会重新组织对于思想学术的发展，以及读书人确立新的角色与身份所具有的意义。在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君子不党”是士大夫政治的重要标志，然中国士人却又向有结社之习性，明清时期尤盛。晚清以降，遭逢所谓“三千年来所未有之变局”，也推动了“合群”的诉求，尤其是伴随科举制的废止，中国读书人通向政治的晋升之路遭到瓦解，更需要新的政治格局中谋求新的力量呈现方式。有关近代中国读书人对新的角色与身份的寻求，不少论著已有所阐述，涉及“学术共同体”及新的社会集团形成等问题。“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概念的流行，尽管可能落入“自由主义萌芽论”之窠臼（亦即“资本主义萌芽论”在政治上的翻版），却也催生出相关的问题意识，即探讨近代中国各阶层与群体，如何经由地缘的、家族的以及共同利益、共同信仰的关系联结为网络，介入到公众事务中。透过晚清读书人的“言说”，就不难了解“合群”如何构成论说的重心。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读书人对于“合群”从各个方面都予以肯定，但如何“合群”，却未必能找到合适的办法。而且，过去时代的遗产也持续在发挥效力。这里所显示的是，“社会”的缺失导致了“合群”难以

〔1〕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收入《饮冰室合集》第5册，“专集”之第23卷，第9页。